

论茶道与医道在当代的融贯

李 萍

(中国人民大学 茶道哲学研究所, 北京 100872)

摘 要:茶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代表性成果。医道则有传统医道和新医道之分。传统医道受到儒道思想的影响,是传统中医学朴素自然主义的体现;新医道则是西医理论、传统医道和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在回答现代性危机和克服专业主义制造的人文缺失方面,茶道和医道不仅可以为世人提供可行的方案,而且可以相互增益。

关键词:茶道;医道;现代性焦虑;心身一体

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365(2019)05-0011-07

中华茶道以在日常生活世界中广泛普及的茶文化为基础,经过历史上无数文人僧侣们的有意识提炼,进入到超日常的意义世界,但又保持了即物、在场的方面,具体表现为俗世生活中的雅趣、闲情、修身等关联心志的内容。不离俗世生活的中华茶道深受儒道思想的滋养。关于医,中国自古有两句众所周知的表达,其一是“不为良相,即为良医”,其二是“医者乃仁术”。前者是讲医事活动堪比治国般的重要地位;后者是讲医务从业者要始终保持仁爱之心。这两句话也大体被视为中华传统医道的基本精神。这似乎使人觉得传统医道只是得益于儒家思想。其实不然,传统医道也离不开道教提供的世界观。中华茶道与传统医道的关联,一方面缘于二者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则在于二者都包含了对当事人身心的关照,并且它们仍然可能为生活于当代社会的现代人提供精神滋养。

一、儒道思想在茶道和医道中的体现

本文将茶道定义为“基于茶自身的性质而

淬炼出的精神世界”。茶自身的性质首先是它的自然属性以及相应地对人身心的益处,饮茶者基于此围绕茶、茶事活动进行情感投射和意识升华,就进入到人所创造出的精神世界。

当然,单纯的喝茶、饮茶本身只是一个生理活动,即便可能上升到心理活动,也仍然以感觉、体验为主,只有到了论茶、问茶阶段才上升到复杂的思维活动,才可能涉及茶道的层面,此时就不再仅仅诉诸感官,还需依凭思维、心智。对个体而言,中华茶道既依靠个人的体证、体悟,离不开品茶者的个人体验(私的方面),同时也主张茶人们围绕茶道深入交谈、沟通并相互激励营造出公共文化世界(公的方面)。

从其内容上看,中华茶道体现了事实与价值未分的朴素自然主义,即它未严格区分茶性这一物理性、人喝茶解渴的生理需要这样的客观事实与因品鉴、投射、移情而产生的价值认同、精神满足这样的主观性应然状态之间的不同。关于中华茶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中华茶道

收稿日期:2019-06-15

作者简介:李萍,女,湖南衡阳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茶道哲学研究所所长,日本东京大学博士后。

对茶本身投入了极大的关注,茶的分量远远重于道,例如中国人品茶除了环境、器具之外,对茶本身的要求很高,非常讲究茶叶的色、香、味、形,茶叶给人带来的益处,茶叶本身的口感、味觉、视觉都得到了重视。因此从思想深度上说,茶道只是生活意义的再现,是“大道”下贯的简易工夫。养生与修心并举、求道与重礼同行,这些都是儒道思想在中华茶道中留下的烙印。

儒道思想同样深刻影响了传统医道。中医原理源于《内经》,其核心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人的内在脏腑气机的转化、阴阳盛衰和病理的变化。中医在不同阶段融摄了不同的哲理,包括道家、儒家、释家,乃至诸子百家之“道”。唐代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论大医习业》中谈到医道之大成者要汇通各家精华,例如“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说的是阴阳家);“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说的是儒家);“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说的是释家);“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说的是道家)。迟至金元时期中医哲学逐渐从道家过渡到儒家,儒家成为中医的指导思想。如金元医家张子和将其医著命名为《儒门事亲》,“盖以医家奥旨,非儒不能明;药裹酒食,非孝不能备也”(《原序》)。朱丹溪代表作《格致余论》云:“古人以医为吾儒格物致知之一事,故特以是名书。”(《提要》)古代良医王礼曾提出“以儒术济医道”^[1],林亿也在《新校注针灸甲乙经序》(1066)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臣闻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不通人曰技,斯医者虽曰方技,其实儒者之事乎。”

中医学是以“术”载“道”的体系,“道”是中医之神,“术”是中医之形。形神不可分离,道术不可偏颇。医道与医术不同,但二者又相辅相成。徒医道无法自存,必须借助医术得以展示,哪怕是悟得了深邃的医道,并不必然保证就会自动获得精湛的医术,这是因为医道和医术获

取的途径不同。医道的获取依靠体悟、体证、反省等主观认知的方式,医术的获取则主要借助经验观察、逻辑思维等客观认知的方式。望闻问切都需要反复操练、勤加比对和验证,经验知识可以增进医术水平的提高,但医道的获取和深化则要靠个体的人文素养的扩充,例如阅读文史书籍、参与人文活动、静思、反省、打坐等。

细究就会发现,道教对医道全盘肯定,儒家则有所保留。儒家对“医者”“医术”的态度存在疑虑、矛盾之处。北宋末年的名医许叔微曾说:“医之道大矣。可以养生,可以全身,可以尽年,可以利天下与来世,是非浅识者所能为也。”^[2]早在《尚书·说命》中就有武丁以医生治病来比喻人臣为相的记载。《国语·晋语》中则有“上医医国,其次医人”的说法。汉代贾谊曾言:“吾闻古之圣人,不居朝廷,必在卜医之中。”(《史记·日者列传》)唐代的韩愈直接将“医师之良”类比为“宰相之方”,他在《进学解》中言:“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登明选公,杂进巧拙,纡馀为妍,卓犖为杰,校短量长,惟器是适者,宰相之方也。”^[3]但另一方面,对“医”的歧视不绝如缕。例如,清中期名医徐大椿说:“医,小道也,精义也,重任也,贱工也。……任重,则托之者必得伟人;工贱,则业之者必无奇士。所以势出于相违,而道因之易坠也。”^[4]将“小道”与“精义”、“重任”与“贱工”两组冲突对立的内容加诸“医”上充分表明,尽管包括官僚儒者在内的士人都能从道理和情感上认可医事活动的重要,但由于习医者向上流动的正规渠道几乎堵塞,以及医生基本上被排斥于国家的正式官僚体系之外,这种认可或亲近仍然是十分有限的。在中国传统社会,世人真正认同和尊崇的仍是相和儒,医只有尽量地向其靠拢,才能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声誉。如果仅仅将医当作取利的谋生之道,即当作职业,那就只是“小技”,而且,也不可能真正

成为良医。良医必须怀有儒者的心态和道德品行。然而,正统的儒家立场并不承认医者、医术的独立存在价值,真正的儒士只是把行医当做权宜之计。不过,即便是权宜之计,行医中仍然要践行、遵守儒家的道理。事实上,中国古代职业医生多为中下才智的卑微之人,医生的地位并不高。

中医学的哲学呈现出“以儒为魂,以道为体,以释为用”的复杂结构。中医的原理无法用现代科学分析一一还原,而是需要行医者像体会禅机一样去格物致知。医生心中似乎无招无式,一切都要随着具体病情的演化而因地制宜、因人施药,制定具体而灵活的治疗方案。但这种中医学很难加以完全的模式化和形象化,因而注定不为多数人所掌握,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悟性与临床经验基础上的揣摩深思而得。医者关乎性命,不可轻贱。君子(儒家推崇的理想人格)应当抱有利泽生民之志和救人利物的仁心。医道就可以有所弥补,它提供了中医理论的人文价值方面的内容,特别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预设。这可以说是中华医道的自然主义精神。人是宇宙中的一物,人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因此,不可能脱离自然来理解人。今天我们的生活更加富足、更加方便,但也离自然更加遥远,我们对自然的感应能力大大减弱了。今天的人们营造了一个看似可以脱离自然、实际上最终依然要受到大自然制约的小环境。古人由于常与自然为友,获得了一套非常淳朴的自然观,复兴传统茶道和医道必须首先认可上述的自然观。

二、茶道和医道都观照人的身心

中华茶道虽然不离茶性、不弃茶用,但其本体是人,聚焦于人,是人在饮茶、品茶过程中的身心激荡和意识返照。茶汤似一面镜子,促使饮茶者反躬自省。同样,中医和医道也有类似、相通之处,例如,中医通常讲的开“方”“开方子”,其实就是开出时空。“方”原意就是方位、空间,

“中医治病的真实境界其实就是利用药物的不同属性来模拟不同的方、不同的时间、空间。时间可以利用药物来模拟,空间也可以用药物来模拟,治疗疾病就是方的转换,就是时空的转换,将人从不健康的疾病时空状态转换到健康的时空状态”^[5]。

茶道之道与医道之道虽有具象上的不同、表现形态上的不同,但在求道者的人格上是完全一致的,都要对道表现出敬重,时时遵守人不离道、道不远人的朴素道理。依道而行就是习德成人,对一位职场工作者来说,这意味着要努力成为本领域的行家里手。“道”不是悬置高阁的绝对理念,而是指导人生活、工作的指南。对人而言,“知道”其实就是达道、得道,成为本领域至道的践行者、发扬者。“中国思想中最崇高的概念似乎是道。所谓行道、修道、得道,都是以道为最终的目标。思想与情感两方面的最基本的原动力似乎也是道。成仁赴义都是行道;凡非迫于势而又求心之所安而为之,或不得已而为之,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无论其直接的目的是仁是义,或是孝是忠,而间接的目标总是行道。”^[6]

茶者是将自己比拟为茶、愿意终生侍奉茶的人。茶者的人格定位最突出的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隐士的豁达,一个是玉石般的温润。与茶相伴的人通常不会过于在意人世的喧嚣、名利的争执,相反,他们更容易被植物的纤细、山川的景色、茶汤的绵厚等所打动,所以,他们身处闹市却心静如水。此外,由于不断受到大自然馈赠物——茶叶的滋养,茶者的性情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待人接物变得更加平和,行事做派更加稳重,他们通常会表现出像玉石般的温润。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由于茶者痴迷于茶,将精力和时间都投身于茶,了然于世外,也就多了份洒脱,为人处世更加自如从容。

查阅古文献就会发现,“医道”鲜少连用,作为独立概念出现,“医者仁术”的出现频率却极高。可见,古代中国人更强调医者(人)而非医道(事)。“医者仁术”的主张强调了医事活动的道德色彩,主要是在医德的意义理解医道。其实,在古汉语中,德通得,所谓“德”,它的原意就是将“道”“内得于己、外得于人”,换句话说,“德”就是“得道”。医德原本就是医道。二者的不同只在于医道是静止的描述,医德则是践行、体悟的动态过程。医道无形,医德有形,需要医者通过自身的合道行为来彰显医道,同样,医道存在于每位医者每日践行医德的行为中。如此而言,医者的人格定位就是做一位有品德要求和自我道德期许的良医。

在谈到医者的人格定位时,需要区分“名医”与“良医”的不同。名医之名是他人给予的,因而是外在的;良医之良则来自于医者自身内心的认同,是自我确信并言行如一后的落地。民国时期宋国宾提出“为名医易,为良医难”,他在《医业伦理学》中说:“医乃仁术,惟仁者为能爱人,盖仁者能近取譬,人之有疾,若己有之,此种美德,医者不仅藏之于心,且能发于动静云为。”同时,他还将仁爱之心分为三种:“爱有数种,曰怜爱,谓医者当具恻隐之心,怜惜之意,使病者觉医师能痛其所痛,而得精神上的安慰;曰和爱,谓医者当举止温和,不可粗暴,尤于贫苦病人为然;曰博爱,谓爱人之心当始终如一,不因好恶而变更,宜博施济众,不因贫富而轩轻。”

中医的一个基本理念就是主张治未病,即未发之前的预防,这极具合理性。这一理念也深刻影响到传统医道,要求医者在医事活动中采取整体、辩证和动态的立场,努力寻求人与自身的和谐。《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素问·刺热篇》说:“病虽未发,见赤色者刺之,名曰治未病。”葛

洪提出:“治身养性,务谨其细,不可以小益为不平而不修,不可以小损为无伤而不防。”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养性序》中说:“善养性者,则治未病之病。”医者要能从养生、五行和合、阴阳平衡等方面祛病并引导患者恢复健康。

实际上,今日中国人说到的“医道”早已经突破了传统医道的范围,是将三个传统,即西方科学传统(理性精神)、中国儒家传统(仁者精神)、共产党的革命传统(阶级情感或革命人道主义)相结合,融汇后形成的医道是一个现代的产物。现代意义的新“医道”不仅年轻,而且内容杂多,其中有些内容之间存在冲突或不一致,这也是造成我们理解“医道”的一个困难之处。这可能还涉及医学与哲学的关系、医者的哲学素养等方面的问题。孙思邈曾提出“哲医”的概念,云:“是以古之哲医,寤寐俯仰不与常人同域。造次必于医,颠沛必于医,故能感于鬼神,通于天地,可以济众,可以依凭。”(孙思邈,卷八十四)《明文海》亦有“甄权、许胤宗、李杲,皆古之哲医也”(黄宗羲,卷三百十六)的论述。当然,古人所谓的“哲”是指介于“圣”与“贤”之间的境界,具有极高的智慧,一般人通常难以企及。

茶道是茶人在闲暇生活中营造意义世界,医道则与高度专业的医事活动相关,但医道明显有别于西方医学的专业主义以及医学伦理的人道主义,它的重点在医者自身的意识成长和习性调整上。中华医道的焦点在于鼓励医者以健康、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患者并接受医事活动中的各种挑战。看似两类完全不同的人群行走在平行的轨道上,其实,他们却又高度相关,在视人(茶人或患者)如己的内心观照上、在立己立人的和谐心身一体(茶道或医道)的追求上是殊途同归、并驾齐驱的。

三、茶者与医者应有共通的良善生活

在今天,经过四十余年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已经摆脱了物质匮乏

和营养不良的处境,他们中的很多人转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要,例如爱的需要、自尊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等,已经有为数不少的人开始追求自由豁达、无欲无争的人生境界。中华茶道的复兴正迎合了现代中国人的价值转向和需要升级。学习茶道、品味茶道可以很好地满足人们超出低层次的需要,进入到以归属、自尊乃至自我实现为主导的需要追求阶段。今天我们提倡复兴中华传统茶道,还有一个历史合理意义,那就是借助古代智慧,丰富中国人的生活领域,以疗治市场竞争社会中被日渐骨感化、躯壳化的现实世界。得益于物质手段和技术水平的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解放出来,闲暇时间增加,可支配的财富也极大增加,然而,发达的物质生活和快餐化消费也使时间碎片化,精致生活追求变得局促和难觅,普遍的烦闷和躁动挤压了人的精神生长的空间。在丰裕时代如何安顿心灵、为我们的精神向往提供场所?茶道生活或许可以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

然而,我们又必须看到,当代中国茶道所处的时代场景已经大大不同于古代。在农业时代和匮乏经济时代,茶乃是稀缺品,好茶或上等茶更是珍稀品,只有殷实之家方可享受,而殷实之家大多受过良好教育。识书达理、品茶论道、鉴茶赋诗等都只是文人士者们雅致生活的追求。今日的情形却十分不同,普通中国人大多可以消费得起茶叶,茶叶的供应源源不断,茶真正成为粗茶淡饭般日常和廉价,饮茶者可能是每个人。此时,跨越全部阶层、通用于所有人群的茶道是否还有存在的可能?随着饮茶成本的降低和饮茶程序的简化,茶日益向民间普及,中国传统的文人茶文化逐渐被平民茶文化取代,平民茶文化是否可以延续传统中国茶道?

在西方,医学是从巫术分化出来的,早期只是极少数具有理性精神的人所作出的艰苦探

索,他们力图用可重复的方法、合乎因果律的推理来寻求生病的原理和治病的方式,借鉴当时极其粗陋的化学、生理学知识开展医学活动。然而,医学面对的对象是人的生命及其身体器官,患者将自身交给医生就充满了风险,医生必须能够驾驭这个风险,值得患者的托付,于是就有了广为传世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 Oath)。古代西方医生在开业时都要宣读这份誓词:“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誓词包含了至今仍被广泛接受的医学伦理要求,它也构成了对全体医事活动参与者具有约束力的行动规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审判纳粹分子医生的罪行后,医生的职业道德和医学伦理问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重视。1948年世界医学会(WMA)在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宣言》,它要求医务工作者谨守:“我保证履行由于我的专业我自愿承担的治疗和帮助病人的义务。我的义务是基于病人所处的软弱不利的地位,以及他必然给予我和我的专业能力完全信任。所以,我保证把病人多方面的利益作为我的专业伦理的第一原则。”

现代医学及其教育都源自西方,但与西医科学相比,包含浓厚西方人文主义意识的医学伦理自律和西医的人文素养要求在中国产生的影响要弱化得多。应当承认,西医的传入极大提升了中国社会的医学水平,改善了病患的处境,医学活动的科学化也使医生的培养成为了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但这也遗留下了诸多问题。例

如,西医关于疾病治疗的原理与传统中国人的生命观存在极大冲突;西医的术业分工、专门化导致无法将病人视为整体;医务工作者只接受自然科学理论的训练,人文知识严重不足;等等。其中一些问题具有普遍性,一些问题则是中国式的特殊问题,特别是医生培养和职业生涯中人文知识的缺乏,这在今日中国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有人说医道就是生活之道。这句话通俗却并不易懂,生活之道又是什么道呢?一个人怎样生活就一定可以怎样行医吗?有人在生活中有某些陋习、恶习,如抽烟、不讲个人卫生,但他做医生、从事医学活动的过程就必须克己,暂时放弃、忘掉上述恶习,这样做才是对的。那么,这句话就完全不合理吗?也不尽然,在强调医道的经常性、日常性、简易性等特点时,“医道乃生活之道”还是可以成立的,它可能想告诉我们,不必对医道敬而远之,只要你想接近、只要你去践行,你就可以获得医道,成为医道中人。

尊重生命尊严,这才是现代医道的核心,它也正在成为今日医学界的基本共识。尊重生命尊严这一现代医道精神可以为医患双方提供达成相互理解的共同立场。它具体包括如下三方面的内容:第一,治病救人。医者以专业技能作出准确判断,提出最佳治疗方案,以便病人摆脱痛苦,早日康复。第二,尊重病患的自主意愿,充分告知患者真实处境,设身处地了解患者的境遇。结合患者的个体情境,该放弃的时候就放弃,不过度抢救。第三,尊重病人的脆弱性。医务工作者要换位思考,设身处地理解病人的伤痛,在心理上予以同情共感。医务工作者因有专业知识,故有责任普及科学的健康知识与合理的生命观念,让病人客观、全面地认识病情与治疗方案,自行采取合宜的方式。这三个方面与医学界通行的医学伦理四原则——尊重自主、不伤害、有利、公正——是完全一致的。但显现医道

精神的途径有千万条,常见的研讨会、案例分析、角色扮演、规则背诵等等,学习茶艺、体悟茶道或许可以成为未来中国医学界和广大医者有益探索的新领地。

在日本,大学的医学院通常会将茶道课作为人文素养课,并设为必修课,要求全体医学生学习。在医院的手术室旁设立茶室,医务工作者可以随时进入求得放松。国内也有一些医院走在了前列。湖南肿瘤医院就在这方面开了风气之先。开设茶室后,该院医务工作者的精神面貌、工作投入状态、人际关系等方面都有了显著的变化。古人云,开卷有益,我们今天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喝茶大益。医生相当于古代社会的“儒者”“儒士”,若要过上古代文人的曼妙闲适生活,琴棋书画诗曲都有难度,唯有茶,简单易行,从每日一杯茶开始,走进茶的世界,在品茶的过程中反观自身,让生活节奏慢下来,排空过度的欲求,做减法,将自身融入茶汤中,达到心灵净化和思想锤炼,以独立自我存于世间。中国古人曾提出“返本开新”,我们不可能从无到有,更不可能从无知到有知,实际上,我们只能从已有到新的有,从旧的已知到新的知。因此,寻求古代茶文化传统的启示、复兴中国茶道(包含了茶礼、茶艺、茶文化等),或许可以提供克服当代过于专业分割导致的人文素养碎片化的危机之密匙。

医学专业毕业只是表明具有从事医务工作的能力,医术水平的提升还要靠实际经验的积累和工作时的用心总结。同样,医道水平的获取也需要下专门的工夫,作出有意识的艰苦努力,并以恰当的方式,才能成功。其中,参加茶会、欣赏茶艺、独自品茶等也是一个方便法门。优雅的喝茶,不会让你的医术水平提高,但可以改善你的心境、情绪和对生活和他人的态度。浸淫茶生活方式久了,你会逐渐成为自己欢喜、他人愿意接近的人。因此,明修茶道的积极外部性后果就

是,你不仅更易于理解医道,而且你与医道更亲近了。

好的生活才是值得向往的生活,而“好的生活”是就价值层面而言的,包含了人类普世价值、可以为人生终极意义提供托付的良善价值。中国茶人讲究品茶,首先要喝出好茶,茶叶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对茶叶的色、香、味及审美意境的追求一直是中华茶道的重点。从唐代之前的夹杂他物的混煮法到唐代的煮茶法、宋代的点茶法、明清时期的散茶泡饮法,泡茶方式朝着自然、简约、生活化的方向发展^①。我们要接续中华茶文化的传统,不仅要充分知晓上述历史进程,而且要以当代人易于接受的方式去阐释中华茶道。破解生活世界中的日常性/非日常性之紧张关系,茶道和医道都可以让当事人在即物中暂时放下,求得片刻心灵慰藉,在体会茶汤带来的口腹之愉的过程中,审美、传心、静思,完成一系列兼及心理、认知、审美、价值等

多重需要,关心自性,给心灵一个安顿之所。

注释:

①相应的,茶叶的制造方式也从蒸青压汁、制饼过渡为烘青、炒青、摇青等方法,制造出能显示茶叶自然形态、色泽、香味的绿茶、黄茶、白茶、青茶等各类产品,形成了千姿百态、异彩纷呈的茶的世界。

参考文献:

- [1]王礼.赠萧同礼序[A].李修生:全元文:卷1852第60册[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4:589.
- [2]许叔微.普济本事方自序[A].伊广谦.中医方剂名著集成[C].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79.
- [3]韩愈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314.
- [4]徐大椿.医学源流论·自序[A].徐灵胎医书全集[C].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97.
- [5]刘力红.思考中医[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55.
- [6]金岳霖.论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绪论”17.

[责任编辑 杨捷]

On Circulating of Traditional Teatism and Art of Medicine in the Contemporary Era

LI Ping

(Institute of Teatism Philosophy, Renmin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eatism is a characteristic fru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rt of medicine includes traditional one and newly one. The former is affected by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naturalism of Chinese medicine; the latter is formed from western medical theory, traditional art of medicine and revolutionary humanism. Teatism and art of medicine can give us the solution to redress crisis of modernity and short of humanities, and more, they can eliminate anxiety of medical action by drinking tea.

Key words: Teatism; art of medicine; modernizational anxiety; integration of soul and body